

天津建卫六百周年

天津
早年的

衣食住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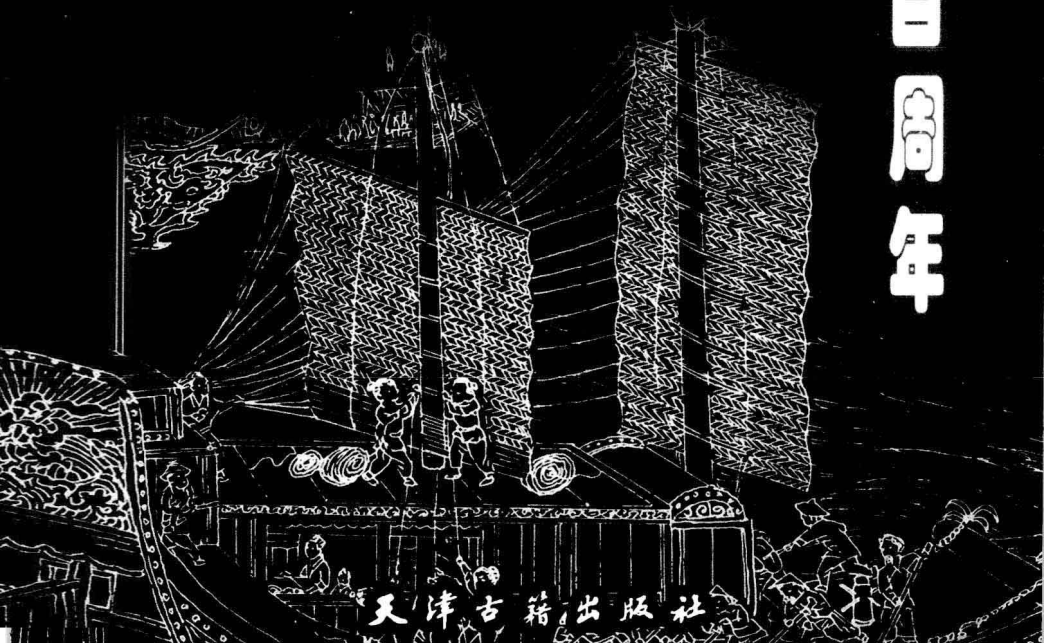
来新夏 主编
张 仲 编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建卫六百年

天津
早年的
衣食住行

来新夏 主编
张 仲 编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总 序

来新夏

2004年12月23日是天津设卫筑城600年的纪念日，这对居住在这座城市和曾经客居在这方土地上的人们具有极大的探求魅力，即使曾到此一游或旅途所经的人们，也都很想知道这座城市究竟是怎样一座城市。它的形成、沿革、特色、物产、习俗、光荣和屈辱……种种城市的内涵恐怕许多人都是语焉不详，也许久已淡出人们的记忆了。

天津设卫建城600年，决不是说天津只有600年的发展史。天津的成陆发展总在四五千年以上，自秦汉至宋元，历代在天津地区挖渠开河，运粮建寨，设官定制，发展鱼盐业生产等活动，遂使天津得以逐步开发。最早记载天津市区聚落起源的是《金史·完颜佐传》，其中所说，金宣宗贞佑二年（1214年）为维护漕粮转输，曾提升武清巡检完颜佐为都统，守卫“直沽寨”。这个“直沽寨”（简称直沽），据今人考证，当在今红桥区西青道一带，或略偏南。当时漕粮在直沽转输的达百万担以上。由于金、元两朝，建都北京，天津地位日显重要。元初虽因河道淤塞，南粮改作海运，但仍由天津转

运入京。据《元史·食货志》所载，每年由津转京的粮食，多达三百余万担，出现了“转粟春秋入，行舟日夜过”的繁荣景象。与漕运并肩发展的是盐业生产，金、元两代，已设置盐务管理机构及人员，在今塘沽、汉沽地区开辟多处盐场，成为重要财源之一，所以天津更为朝廷所重视。元武宗时（1309年）又把直沽提升为都指挥司级别的地位，仁宗时（1316年）进而改直沽为海津镇，并在大直沽设接运厅和粮仓以接运和储存漕粮。漕运的船工为了祈求航运安全，先后在大直沽（元初建，后废）和东门外（元泰定三年建，明清时重修、扩建，今存）建立天后宫，供奉海神。金、元两代对天津的经营，使天津由聚落逐步走向都市的条件，渐臻成熟；但是天津作为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都市却是在明清时期完成的，而作为这一转折的重要标识则是明永乐二年至四年（1404~1406年）间的设卫筑城。

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明朝后，为了酬庸和巩固王朝权力，遂封诸子为王，分守各地，其第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驻守北平。1398年，明太祖死，因太子早逝，由太孙允炆继位，是为惠帝。允炆庸懦，而燕王则经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和苦心经营，在诸王中实力最强。也许出于更好地延续发展和强化明政权的需要，燕王决定发兵与侄争位。他率兵由直沽“济渡沧州”（嘉靖二十九年《重修三官庙碑记》，天津历史博物馆藏碑）南攻。征战数年，终于在1402年，攻入南京，即帝位，是为成祖，年号永乐。明成祖在成功喜悦之余，为了纪念始发兵的“龙兴之地”，把直沽这个曾是“天子渡河之地”（李东阳：《修造卫城旧记》见《天津卫志》卷四）赐名为天津（天是天子之义，津是渡口之义）。关于天津的得名，有星座说、津河说、关口说和赐名说等各种不

同说法，但赐名说既有上引比较翔实充分的文献根据，又为津民口碑所熟知，所以当以天子渡河而得名之说为近实。

明成祖虽即帝位于南京，但他不能遗忘自己的实力据点北平，必然要把政治中心北迁，把北平作为他的北京，以维护和巩固他的新政权（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不肯赴南京就职，不惜制造兵变，坚持建都北京，与此何其似也）。但在迁都北京之前，他必须先要把作为京师屏障和门户的天津建设好，于是在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下令在天津设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统称三卫，天津的第一部志书就以《三卫志》为名（今佚）。并在这一军事性的据点驻兵16000余人，以拱卫将建立的京师和维持当地的安全。并命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都指挥金事凌云、指挥同知黄冈“筑城浚池”。

天津城的初型是以土版筑，城基距地表约四米，逐层用黄土夯实，土层间铺撒碎砖瓦和瓷片，类似后来所谓的“干打垒”，所以称为“筑城”。这座土城周长九里余，城高三丈五尺，宽二丈五尺，城的形状是东西长，南北短，很像一把算盘，所以津民有称之为算盘城的。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土城建成，于是作为天津卫所在的实体矗立起来，至今犹啧啧于津民之口的“天津卫”这一惯称，也自此出现。时隔五年，明成祖将一切部署就绪，便于永乐七年（1409年）正式北迁，建都北京。天津也从此承担起明清两代捍卫京师的职责。

但是，土城筑成将近百年时，就日渐倾圯残损，而不得不修建加固，于是在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由时任天津兵备道的刘福主持，用砖包砌加固，城池同修，各门增建瓮城和城楼，历时两年竣工。四门分别题写了镇东、定南、

安西、拱北匾额，显示其拱卫京师，安定地方的武备作用。城周较土城略有拓展，但基本未动。其城圈就是现今东、南、西、北四条马路的内边，也就是过去白牌电车围城转的线路。明朝政府很重视这次重修，特由当时重臣、文学家李东阳亲为之撰写《修造卫城旧记》，记其始末，为天津城建的历史留下了重要文献。

设卫筑城后的天津，各方面都有较快发展，特别是粮、盐两个经济支柱更为显著，明永乐初由于北运河淤塞，由南方海运至津的粮食，难以及时运京，仓储业大为发展。曾有露囤千所，甚至在北仓还建立了百万仓。不久迁都北京，“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一仰漕于东南”（傅维麟：《明书·海漕志》），天津转输漕粮任务日增，至明宣德十年（1435年），明政府特在津设户部分司，作为管理漕运的专门机构。当时大运河上粮船万艘，转输漕粮五百万担。繁荣景象，可以想见。

鱼和盐是天津的两项重要财源。明在建国之初，即设“河间长芦都转运盐运司”，管辖以天津为中心的产盐区。天津不仅是产盐区，还是营销中心，长芦盐之名由此而起。由于采用日光晒盐法而产量大增，据一种计算，明末长芦盐运销量已达239,800余引（每引650斤）。天津的渔产也很丰富，《天津县志》特著其事说：“津邑，滨海区也。鱼利与盐同，捕鱼不下三十种。”天津流传下来的许多风土诗也都盛赞天津渔产的丰美。鱼盐之利推动了天津经济的发展。

漕粮的运输，无论海运，还是河运，都带动了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粮船为了调剂漕丁和水手的收入，允许在漕粮外，随带一定数量的各地货物以搬迁有无。这些货物大部分在天津卸载、发卖和转输，因而在三岔口不远的东门和北门外就形成了若干商业区。随之货栈、钱庄、会馆等行业和组

织，都应运而生。集市贸易也随之而兴，十集一市的轮转，遂有“天天赶大集”之说。一些服务行业如饭庄、酒楼、戏院，更是迭兴不已。

天津从设卫筑城以来，经过有明一代的经营，到明清之际，它终以有拱卫京师门户，河海转运枢纽，商业繁荣兴盛，富鱼盐之利，招八方来客的优越条件，而成为人所瞩目的要埠，远远超出单纯军事要冲——“卫”的地位。所以康熙《天津卫志》特以浓彩重墨概括其盛况说：“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南运数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咸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所杂处……名虽曰卫，实在一大都会所莫能过也”。清初史学家谈迁赴京过津所看到的天津，已是“镇城百货交集，鱼虾蟹蚌并贱”（《北游录·纪程》）。顺治十二年（1655年），荷兰使节哥页赴京，路过天津时，曾把天津与广州、镇江并视为中国三大港口。天津的“人烟稠密，交易频荣”，使这位使节惊讶，并命其随从人员将三岔口和海河两岸的景象，绘图带走。天津已是一个比较成熟而开放的城市了。

天津自设卫筑城以来，历经600年风雨沧桑，有多少可歌可泣，可喜可悲的事迹和人物，等待述说弘扬，并留存于图画文字，以教化当代，垂示后世。迎接设卫筑城600年，不仅要欢庆这个城市的光荣节日，更希望在迎候它的日子里，有更多故老贤达写出信而有征的往事风情，为我们的天津留下更多的文献积存！

我籍隶浙江，出生杭郡，而侨居天津七十余年，直等第二故乡。食于斯，长于斯，学于斯，老于斯。乡恩深重，值此庆典，何得无报？乃于2003年春，邀约津沽名流学者，相与咨谋，众议仝同，共定编撰《天津建卫600周年》丛

书，以为文献积存之祝。共立八题，目次是：

一、天津的城市发展

二、天津的人口变迁

三、天津的方言俚语

四、天津的园林古迹

五、天津的邮驿与邮政

六、天津的九国租界

七、天津的名门世家

八、天津早年的衣食住行

题目既定，撰者分册撰写，每册十余万字，各有随文插图，期以一年。2004年春，各稿相继完成，逐册循读，大都相契，而各有所见，亦未强求划一。全套丛书共八册，近百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社长刘文君女士，欣承出版之任，情义可感。责编韩嘉祥先生，学识优长，不辞辛劳，奔走于撰者之间，商榷修订，终底于成，如期问世，功不可没。撰者诸君殚精竭虑，共成斯举，为津门增拓文献积存，颇著勋绩。我则追随诸君子之后，稍事擘划，与有荣焉。设有不足，则我当独任其责，幸读者垂察！

二〇〇四年六月写于南开大学蘧谷

前 言

应来新夏教授之邀，写这本《天津早年的衣食住行》小书，内心又激动，又不安。激动的原因，是我在天津经历了七十多个春秋，看到了许多人和事，而终生不能忘记。这些正是宝贵的民俗事象。不安的是，对民俗事象的认知是相当困难的：亲历者不过得之五六；传承中博闻强记者不过得之三四；道听途说得者，一二而已。而且，有些是人言言殊的。这就要以最典型最具代表性者写入书中。但是，问题并未完了：如以一二质诸五六何如？何以正误？这就让人惴惴不安了。最后的结论，只好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只好有待于来者，或者竟是来者后的来者了。

衣食住行是民俗事象。天津设卫筑城六百年矣，作者是沿



着民俗传承这一线索而写的。举如窖冰工人所穿的“皮鞋”，业内老人写它为“靛”，读如邦，我写作时因忆起从前听过的，用牛皮封的草鞋，名“牛皮绑”，“靛”“绑”音近（声调有差），就在写窖冰工人的服饰时，我采用了“靛”字。另外，对于有异说的事象，则尽量兼收并蓄。

由于衣食住行，谈到的都是天津的民俗事象，所以在撰写本书的时候，往往用天津方言词中有关名词作物名词。首次出现时适当予以解释，下文则径直书写。同时，为了阐述衣食住行，介绍了天津老城一些有关的方言、专有物名词，这是民俗学著作应有的内容，也为本书适当增加些趣味性。

民俗学向来有考古民俗学与当代民俗学之说，由于丛书要求时间跨度自明至建国前，谈民俗事象，自然不能脱离其历史发展，也即有关考古民俗学的内容。而读者正是要弄清民俗事象的来龙去脉。所以本书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不是作者怀旧，热衷于宣传封建迷信，而是说明前因后果。在中国民俗中，有很多是“以非为是”的（如男人辫发，清初汉族男子以“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拒绝，后来变成全汉族的风俗；民国成立剪辫子，又遭到拒绝，理由仍然是“身体肤发，不敢毁伤”）。现在看起来，不可理喻的“非”，历史上不只风靡一时，而且世代传承。这本书写的是天津六百年的民俗

史，因此，有些内容，并非代表作者欣赏与提倡它。这是不能不予以说明的。

张仲 癸未春

时年七十有四



目 录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天津民风民俗的三次变迁	(2)
一、天津人的服饰	(4)
1. 设卫初以官服与军服为主要服饰 ...	(4)
2. 明末天津卫降官如潮	(8)
3. 入清当时天津文人服饰	(9)
4. 清代天津人的“短打扮”	(11)
5. 清代属商人服饰最奢华	(13)
6. 清代女服	(15)
7. 混混装束	(17)
8. 男人礼服马褂	(19)
9. 上装的衣袋	(21)

10. 女子服装特色	(22)
11. 男人冬服的“二大棉袄”	(23)
12. 二十世纪初的服装变化	(24)
13. 天津服饰禁忌	(26)
14. 穿戴逐渐现代化	(30)
15. 中国最早的服装街——估衣街	(31)
16. 天津服装佩饰民俗	(38)
17. 市井中的服饰行业	(43)
18. 有关服饰的俗语	(47)
二、天津人的饮食	(52)
1. 河海两鲜	(53)
2. 应时到节	(54)
3. 食俗与冀、鲁比较	(55)
4. 吃菜注意“俏头”	(58)
5. 天津菜的口味	(59)
6. 天津饭馆的出现与兴盛	(60)
7. 清真菜馆	(63)
8. 全羊大菜	(64)
9. 从字号看菜馆变迁	(69)
10. 天津菜民俗特色	(78)

11. 天津菜肴中的名品	(80)
12. 天津土话中的吃喝	(85)
三、天津人的居住	(90)
1. 天津城	(90)
2. 住房規制	(92)
3. 天津四合套	(94)
4. 四合套的门楼	(95)
5. 院落布局与儒家思想	(100)
6. 普通民居	(103)
7. 1860 年后出现洋楼	(105)
8. 小洋楼	(106)
9. 房屋所有制	(109)
10. 房屋租赁与典当	(111)
11. 住宅装修	(113)
12. 炕的重要地位	(115)
13. 房间各有用场	(116)
14. 天津“八大家”	(118)
15. “八大家”的兴替	(123)
16. 房地产业中的特殊人物	(129)
四、天津人的交通	(133)

1. 城内外官道	(133)
2. 从海运到河运	(135)
3. 桥梁渡口	(136)
4. 交通工具和马	(138)
5. 水路航运	(163)
6. 冰床	(168)
7. 天津话里的“行”	(169)
五、衣食住行中的特殊篇章	(173)
1. 衣中的葬服与丧服	(173)
2. 食中的特殊行业	(175)
3. 住宅设施中的“天棚”	(184)
4. 与行有关的特殊行业——脚行	(186)
六、岁时节俗中的衣食住行	(193)
七、人生仪礼中的衣食住行	(209)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天津，“初仅一渔堡耳”。元名直沽，明永乐初披草莱而设天津卫，并筑城浚池，本系军事建制，居民多为军籍，民间尚武，有“官不读书，皆武流；万灶沿河而居，日以戈矛弓矢为事”的说法（明汪来《毛恺去思碑》）。明清以来，因天津一地与京都近在密迩，成为“畿辅喉襟之地”，“地当九河津要，路通各省舟车”，是“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云集，五方人民之所杂处”，南船北马、轮蹄若织的大都会。

天津民俗，在衣食住行上，与中国传统文化自有传承关系，与各地风俗也互有影响；同时，天津在民风民俗上更具有本身独特的个性。

天津民风民俗的三次变迁

天津在民风民俗上的独特性,表现在经过三次较大的变迁。元代民风朴厚淳良;明代天津卫居民崇尚武功,城乡各路口都有军士分兵把守,甚至死人出殡也统由本地界的杆房料理;扎制纸人也由本地块的工匠承办,不得越界到他处雇佣,虽然价格悬殊,居民也只得低头忍受。明代天津卫是军人武力横行、各霸一方的局面。入清以后,商业发达,风月繁华,天津民风转入城市市民文化占统治地位,俗尚奢华。到清代中晚期,西方侵入者一直想侵入北京,但这是天朝所不许可的,于是,天津成了西方人侵者的“过渡地带”,美其名曰“通商”或“开埠”,实则租界成为洋人的天下。因而天津城市又变为“华洋杂处”,成了中西文化撞击、交融的场所。